

学术随笔

自由与审美

——休闲的两只翅膀

马惠娣 / 著



休：『静也』，以修身、
以致远。

闲：『雅也』，言行正、
不逾矩。

心好、心安、心静、心悦、
心正，乃休闲之本。

学 术 随 笔

自由与审美

——休闲的两只翅膀

马惠娣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与审美：休闲的两只翅膀 / 马惠娣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039-5122-0

I. ①自… II. ①马…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5262号

自由与审美——休闲的两只翅膀

著 者 马惠娣

责任编辑 尹建华

装帧设计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1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 × 1000毫米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5122-0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自序

我生性倔强，有时会一条道走到黑，这个性格却促成我执着于休闲研究20年。坦率地讲，当年我的职业是做编辑，职责是选好文章，编好杂志，按期出版。至于研究学问，发表论文，那完全是“你没事找事干”。

19年前，当于光远先生把我引向这个领域的时候，我的学术很稚嫩，学力很孱弱，而当时“休闲研究也是一片不毛之地”。虽然是差强人意，但是很快我对休闲这门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开始查找休闲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依据，明白了：休，“倚木而休”；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好。闲，“安静从容”、“闲情雅趣”、“纯洁守矩”，这些涵义对人很有吸引力。16年前，我访问美国，才知人家的休闲研究已有百年历史。

过去我编辑《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侧重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中提出的哲学问题。那个时候写了许多科学人文性的文章，但是却从未想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正提出的一个重要课题：“科技进步，闲暇时间越来越多，且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从事科研的人都知道，“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后来有不知情的人问

我：“马老师，你怎么如此有前瞻性地来研究休闲？”我说：“开启这门学科的是于光远先生，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研究者。当年我有十个脑袋，也不会想到把休闲作为社会哲学来研究。”

于光远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奠基人，当1995年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后，他就指出：闲暇时间是时代的大问题，是哲学的问题。在他的影响下，许多有识之士加盟在他的麾下，由此开辟出了中国休闲研究之路。

我是幸运之人，一路走来都是高人牵手——他们前面引路、铺路，留下了“休闲中的处处美景”，使我流连忘返，竟是近20年。

过去的20年，于光远先生经常嘱我，学者要有两种情怀：一是热切的社会关怀，二是深切的学术关怀。要有两种能力：目光远大——站得高望得远；眼睛要向下——关注现实问题。要掌握两种方法：一是咬文嚼字，即定义概念要明确；二是广征博引，即思维开阔、兼容并蓄。而“独立思考、精神自由、自成一家”是他的座右铭，我从中也受益匪浅。

在我与他的合作中，他善于用苏格拉底式的方式与我讨论，让我这个智商不高的人慢慢开窍。尤其于老发散型的思维方式，不羁的思想过程，否定中的独立意识，广征博引中的自由人格，不趋炎、不附势、不唯书、不唯上的傲岸之气为我的研究树立了一面旗帜。

应该说，过去的20年，我力所能及地做了点事——出版了译著和自著，发表了若干论文与文章。这些事基本没有

压力、没有功利，而是出于我的兴趣。师长们看到了这一点，不断地给我鼓劲加油，这种鞭策给了我动力和毅力。当然，每在困难时刻，都有贵人相助、有朋友相助、有家人相助，这些助力，给了我自信与激情。这里不能不说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文章院长及其他领导，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始终如一地厚爱与扶助中国休闲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刘梦溪所长十数年营造“柏拉图学园”不断充足我的学术养料。

休闲，是人的生存的一种形式，是生命的一种状态，是育化生命的“侍者”。她以“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的方式滋润着人们的心性、智性、品性、德性，在绵延的文化长河中默默地，也是铿锵地护卫着人的精神家园。然而，她的沉寂与默然，在后世人的喧嚣中却被遗忘了。

谁能不承认当代人已把休闲弄得一塌糊涂，上至专家学者、公仆官员，下至黎民百姓。人们忘记了休闲这只柔美的“彩蝶”飞舞在精神花园中，留下了串串的“珍珠”；人们忘记了生活中没有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的陪伴，那是“猪的世界”。

如今，我们的时代物质繁盛、生活炫目，但喧嚣与贪婪正吞噬着人性，“头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都与我们越来越远。毋庸置疑，当代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缺少两样东西：一是自由，二是审美——它们是休闲的翅膀，是生活的翅膀，是劳作的翅膀，是向上的翅膀。没了翅膀，何以腾飞？

我们的先贤在造字时，“休”与“闲”赋予人“静也”，“雅

也”；主张心好，心安，心静，心悦，心正。其实，休闲与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科学的关系很密切——哲学研心、文学疗心、休闲静心、艺术悦心、宗教安心、科学正心——这是“百年树人”最肥沃的大地。把这样的理念带给读者，我想，当是“上帝”给我的担当和使命。我自知，现在出书易如反掌，多为无用之作，或误世之作。“休闲”话题之于媒体和出版界亦是一个热闹的门庭，但难寻静心之作。我清夜扪心，何以自安？

古人常常“大言至简”，《道德经》仅五千言，流传万古。我自知没有“五千言”的智慧，只能尽量从过去十几年间百余篇的散文、随笔、杂记、札记、游记、率性之笔中选出40余份谏言和简篇，也有略带人文故事的长篇。这些文章大多未曾发表。

我从小曾经有“文学青年”的梦，可是我才不材，只能望洋兴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经想去鲁迅文学院文学班学习，还曾跟随于光远去那里听了他的一次讲座，时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的周爱若先生欣然接受了我。最终是阴差阳错，失之交臂。“上帝”认为我无文学天赋，就让“休闲”考验我。

20年休闲研究我有一个心理体验：以欣然之态做心爱之事，此话也成了我的座右铭。因为自由，我的思想少有羁绊，常常天马行空——“神马都是浮云”，“什么都是神马”。

2014年2月17日

目 录

CONTENTS

自序	1
----	---



中国休闲学在他的目光下一路走来	1
缅怀中国休闲学的奠基者龚育之老师	10
中国休闲研究不能忘却的人	16
怀念武衡同志	21
张中行先生走了	24
肖南百日祭	29



呼唤中国的休闲教育	37
自由时间：人是自由的吗	39
中国文化资本的隐忧	42
“黄金周”之痛	47
叩问“假日经济”	50
人人都该享有休假权	52
节庆日：集体的精神洗礼	55
麻将：诟病于中国人闲暇生活	57
中国旅游缺什么	62
自由与审美：休闲的两只翅膀	66
玩是人生的根本需要之一	68

◇	
好的城市，才有好的生活	71
人为什么要有精神家园	76
幸福究竟来自哪里	78
带薪休假与幸福感有多大关系	81
休闲生活三趣：好书、好师、好友	83
“下午茶”与诺贝尔奖	86
风从这里来	89
中、外洗浴史一瞥	92
《吃茶去》中的科学与美学	97
◇	
烟花三月，扬州又邀故人来	101
成都纪行（五则）	118
欧洲之旅，我的奇遇奇记	126
意大利纪行	143
英国社会观察	149
“世界一流”的瑞典宾馆	168
阿拉伯世界的人文之花	171
◇	
瑞虎夕下 玉兔东升	175
龙年意味着什么	177
感叹2012	180
2013：回望与展望	183
◇附录	
为什么是休闲学，而不是闲暇学	190
谈谈休假的价值	200
以欣然之态做心爱之事	204
答问凯瑟琳·贝克尔的专访	208
后记	214

中国休闲学在他的目光下一路走来

秋寒叶落雁南飞，碧水长天鹤不归。

苍翠青松山岩立，奇绝逸峰挂天垂。

中国休闲学奠基者于光远先生于2013年9月26日凌晨3点42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8周岁。

于光远，生于1915年7月5日，上海市人，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家、社会活动家，是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

他学养深厚、人格高尚，视思想与写作为终生“享受”；喜欢独立思考，长于哲学方法，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追求思想创新，自称“望家”和“发起家”。凭着他的睿智、胆识、敏锐，常常云人所未云，发人所未发。对哲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化学、科技发展战略、文学作品等几十个领域都有独到的贡献，涉猎范围之多、之广在中国的学者中还不多见。

他的人生原则是：独立思考，自成一家。独立思考，即目不随人视，耳不随人听，口不随人语，鼻不随人息。自成一家，即要刻苦钻研，不做

思想懒汉。承认自己所说是家之言，无垄断真理之意，要向别人学习和争鸣。

他的学术深深植根于社会、生活，常常犀利地透视社会现实和基层民众中的各种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他强调：我们的研究工作不应该限于一般的、抽象的思辨，而是要去作特殊的、具体的研究，向着实践的方向前进，直到实践中显示出这种研究的重要意义。

他一生出版了约有2000万字的作品，主要代表作有：《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我的教育思想》、《碎思录》、《“文革”中的我》、《于光远短论集1977—2001》、《论普遍有闲的社会》、《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窗外的石榴花》等。

近30余年来，由他创立了自然辩证法、国土经济学、发展战略学、技术经济学、未来学等几十个新兴学科。

休闲学是他晚年对中国学术界作出的又一贡献，成为中国休闲学的缔造者和奠基者。以下是自1995年以来，他所参与的休闲活动和发表的文章的概述。

1995年5月在中国实施每周五天工作制后，他于当年的7月在北京成立了休闲文化研究小组，组织各界人士开展对这一新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此后，他的家里常常成为讨论休闲问题的集会场所。

1995年7月在庆贺他从事学术活动50周年的会议上，他提议由我主持一个哲学咖啡屋，他希望中国的学人像巴黎人那样坐在巴黎左岸，喝咖啡谈哲学、谈科学、谈艺术，相互碰撞思想火花。

1996年他发表了长文“论普遍有闲的社会”，指出：“争取有闲是生产的根本目的之一。闲暇时间的长短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同步的。从现在看将来，如果闲的时间能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增加，闲的地位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这是未来社会高速发展的道路。”同年4月在北京他组织了“休闲文化研讨会”，凭借他的学术与社会影响力，该研讨会吸引了首都理论界、新闻界、学术界众多人士参加。

1997年，他成立“玩的俱乐部”，亲自组织“踏青”与郊游活动。

1998年，他发表题为“休闲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一文，指出：“关于休闲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问题，我想从社会主义的立场上讲一个道理，搞社会主义为的是什？说到底还不是为了全体社会成员生活过得愉快。我们提倡艰苦奋斗，但苦不是目的，苦是为了乐。现实的、可以使人们快乐的事，我们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没有理由忽视。”

1999年，他参加了“西方休闲研究译丛”（第一套）的编委会工作，并亲自主持与云南人民出版社联袂召开的第一次编委会，在他的影响下，成思危、龚育之均在百忙之中莅临。

1999年春，我随他去河北燕郊，在行进的路上他与我谈到了休闲哲学问题。他问我，中外哲学史中是否有对休闲的论述？还问我，休闲在人类文化史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是否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他认为哲学是方法论和认识论，是学问的核心，同样适用于休闲研究。

2000年9月8日，他出席了“中国首届休闲产业国际论坛”，并在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他指出：“休闲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高，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些人只看到开展休闲业带来的经济利益，而不研究休闲本身，比如说，‘假日经济’，不多讲如何使人过好假日的生活，那么发展休闲产业的基础就不牢。”

2000年五一之后，他看到了旅游“井喷”的场面，在一次会议期间，他对我说，旅游问题是需要认真关注的，因为，旅游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而且具有文化属性，还是现代生活中的一种休闲方式。他当即提出写“旅游词典”，许多条目就是在那次饭桌上边想边提出的。后来他又对条目框架做了多次修改。

2001年，他为一企业题字：“玩是人生的根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掌握玩的技术，发展玩的艺术。”

2002年10月，他出席中国首届休闲与社会进步年会，并在会上呼吁人们要学会玩，玩中会孕育许多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在他的影响下，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的韩克华，科技部副部长韩德乾，外交部大使陈鲁直，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马俊如，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孔德涌，时任中国艺

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文章，时任文化部教科司司长童明康等人均出席了会议。

2003年初，在他的影响下，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休闲研究中心。

2003年，时任世界休闲组织秘书长的 Dr.Gerald Konyon 先生亲自到老家中拜访了他。

2003年12月，他亲赴海南博鳌参加并主持了“首届中华麻将论坛暨公开赛”，并在会上指出：“把麻将用于赌博，乃人的问题，而非麻将之过。把赌博现象归罪于麻将，显然是人在逃避责任，是我们的智慧出了问题，是我们的创造力远远不够。值得人们很好地反思。”在他的建议下，成立了世界麻将组织，他担任了首届主席。

2004年3月，他出席“我国公众闲暇时间文化精神生活状况的调查”课题评审会议。在会上，他提出，闲暇时间，属于时间的范畴，在当代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时间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哲学问题、科技问题、艺术问题。

2004年6月，他出席“2004——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学术年会”，并作“休闲的理论与实践”的主题演讲。在他的感召力下，原宣传部部长朱厚泽，原全国政协秘书长朱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明瑜，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北京大学孙小礼教授，中央党校沈宝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何伟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刘梦溪教授等出席会议。

2004年10月，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著《论普遍有闲的社会》，收录了他自20世纪70年代末所发表的与休闲相关的论文与文章。

2005年1月，出席“‘中国学人休闲研究丛书’出版暨学术座谈会”，他在发言中指出：休闲是我们这个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关乎构筑健康、科学、积极的生活方式，关乎全体国民素质的提高，关乎社会的和谐发展。“闲”是最大最大的字眼，因为“闲”同“社会生产力”这个大字眼相连。既要重视有文化地“休闲”和“消遣”，使之对社会的进步起积极作用，又要注意克服消极的填充闲暇的方式。所以我们应多管“闲”事。这次会上，他向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提出召开一个“流行歌曲歌词的

文化批评”的学术研讨会，他认为，流行歌曲的歌词很特别，值得研究文化的人关注。

2005年休闲年会以“休闲与城市”为主题在浙江江山市举行，他在书面发言中指出，建议在关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到生活方式的研究，尤其是现代社会中的生活方式应具有多方面的文化要素。

2005年8月16日，他为江苏教育出版社《闲暇教育》一书作序，其中写道：“我个人的经历说明，闲暇时间是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第二课堂，而且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课堂，可以在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任何方面获得学习机会。学会珍惜，并有效、合理地利用闲暇时间，你就拥有多方面发展自己的能力，你就一定会有丰富而充实的人生。反之，利用不好，闲暇时间也会加害于你，轻则使你虚度人生、碌碌无为；重则使你误入歧途，害人害己。这就是‘闲暇的辩证法’。”

2006年5月，由他破题，我们共同完成了《休闲·游戏·麻将》一书，11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正式出版。他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有这样一段话：“闲暇时间多了，我们干什么？这是时代的大课题。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有很多深刻的论述，认为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都是时间的节约，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因而，利用时间问题是一个极其高级的问题。”

2006年年底，在他的影响和努力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批准成立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

2007年，他出席在密云召开的以“休闲与媒体”为主题的论坛时指出：“媒体如何关注休闲与休闲经济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特别是媒体如何帮助政府与老百姓认识休闲的价值，认识休闲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认识由休闲生活的增多而引起的社会关系和产业结构的变革等。这些对于媒体来说既是新的课题、新的挑战，也是新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2007年，他为休闲年会题写书面发言，指出：“休闲研究在中国也有10多年的历史了，也出了很多的成果，涌现出了很多人才，开展了许多工

作，已经具备了必要的条件。我想，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特别是在形成和培育休闲研究中国学派上下功夫。”

2007年3月14日，他躺在病床上建议我主编一本有关“休闲研究”的杂志，最好是图文并茂，体现人文性、知识性、趣味性，文风和内容最好活泼一点、轻松一点、悠闲一点。除了必要的论文外，还可以开辟“域外采风”、“休闲趣事”、“风景线”、“幽默故事”等方面的栏目。出游游记、休闲生活、名人专访等都可以反映进来。他还说，我可以帮你设计栏目，我帮你邀请一些人写他们的休闲生活。我和龚育之都是你先采访的对象……我知道现在的协会和研究院都缺少经费的支持，但是大家可以共同努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创办一个专业刊物。我现在的身体和精力虽然都不如以前好了，但是我还愿意为休闲研究刊物做工作。

2007年12月9日我到他家，他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今天是‘一二·九’青年运动72周年，我特别忧虑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体状况。这个群体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有热情，但压力也大，很多人不注意平日的体育锻炼。小马，你要关注这个现象。”

2008年，他在休闲年会的书面发言中指出，国计民生不仅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问题，也包括关心他们的休闲生活问题。现在闲暇时间多了，我们干什么，怎么干？这是时代的大课题。

2008年8月，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于光远马惠娣十年对话：关于休闲学10个基本问题》一书，书稿完成后，他有几点想法，并写在序言中：“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休闲在传承文化方面一定有独特的价值。我们确信中华民族的休闲理念有优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质在其中，需要认真梳理，不能因近现代以来休闲的没落而抛弃她。当然，对此既不可妄自菲薄，也不要妄自尊大。另外，我建议，向世界输出中国文化时，也应包括中国人的休闲智慧和休闲价值观以及由此创造的各种艺术形式。”

2009年8月，他为休闲年会题字：“关注国计民生中的休闲，关注休闲中的人文关怀。”

2009年10月，他以94岁的高龄出席了他人生最后的一次国际会议

(国际休闲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中期会议暨2009——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学术年会),他亲自到会,并与全体代表合影。在会上他的发言由秘书胡冀燕完成。发言指出:“我曾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职务,也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我以为,社会科学自诞生以来,就在不断地吸收各个学科门类的营养,形成了开放性、跨学科性、包容性等学科特点,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它的研究方法。20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学协会就成立了休闲研究委员会,不难看出社会学对新生事物敏感捕捉的能力,也不难看出休闲问题之于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

2010年,我每次去他的家里,他都会带我走向客厅中的书报柜前,翻两本杂志给我看。他告诉我说,听说××杂志办不下去了,你到天津跑一跑,接下来把它办成《休闲专刊》,休闲研究需要一个园地。就在那一年,不知他说了多少次这件事。然而,我却没当回事,当然,也没有能力办这件事。现在想来,不仅对不住于老,也辜负了他的一片心意。至今,我的内心总是隐隐地痛。

2011年,由于身体原因,他未能亲自为休闲年会题写讲稿。征得他本人同意,选取了《休闲·游戏·麻将》一书“序”中的片段,作为会议的书面发言。这段话是这样的:“休闲的价值不言而喻,没有闲,人的自然成长都有问题。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强调休闲的,我特别欣赏《道德经》中的一句话:‘多闻数穷,不若守中。’意思是说,人的心灵要保持清静,而不要旁骛太多,没了章法和智慧。因为,人一忙就容易乱,头脑不清醒;人一忙也容易烦,心情不能和平;人一忙就容易肤浅,不能研究问题,不能冷静认真思考;人一忙就容易只顾眼前,不能高瞻远瞩。”

2011年10月29日上午北京医院,我对他说:“休闲年会将在峨眉山召开,你去吗?”他摇摇头。“你想对参加会议的代表说点什么?”他说祝会议成功。

2012年,他为休闲年会书写书面发言,指出:“休闲这一社会文化现象,以及休闲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值得理论界、学术界、教育界以及政府部门认真研究、认真对待。”

近些年随着年龄增高，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坐轮椅、走天下”开始成为奢望，而他老人家却开始了“坐轮椅、走社区”，进而思索北京市民的休闲生活，希望理论联系实际，做具体的研究。每次去社区，他的观察都很仔细。他注意到一位梳长辫子的中年女性经常在这里打乒乓球。他嘱我找这位女同志了解一下，她是否下岗了，还有什么业余爱好？闲暇时间都怎么分配……”

休闲研究在中国常常遭人指责。一些人认为这是对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青睐，是自由化的回潮。即使在学界，也把休闲当成是对吃喝玩乐的眷顾。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意识形态时常利用多种场合向休闲研究发难。是他不惧冷言恶语，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声张休闲研究的文化意义、时代意义与社会进步意义。这些都记录在《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一书中。

近一年，于老的听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渐差，一般情况下，主要通过小黑板进行交流。但是他的思维非常清晰，记忆力也很好，比如，他跟我聊起他的妹夫早年在盐城新四军任政委，名叫施光华，小名叫荣涛……也记着我家的地址，曾在我家吃过饺子……

2012年初于老住进医院，2月10日上午我去看望他时，在小黑板上写下：“文化部批准成立中国休闲文化研究会，请您担任名誉理事长”，他看过微笑着。春节期间探望他，我在“小黑板”上写下一行字：“过年大家都忙疯了！”看过又笑了，问我：“为什么”……

2012年7月9日上午，北京医院。到病房时，于老正醒着。跟他打招呼时，他睁大眼睛、点点头。随后给他展示《于光远休闲思想文献回顾》小册子，他一直看着。我又在小黑板上写下“于光远休闲思想文献回顾”几个大字，他专注地看着。

2012年12月25日下午，北京医院。于老的精神不错，我在小黑板上写下了“2012年休闲年会开得很好”，他仔细地看过，点了点头。我接着又写了“小非非已考取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数学系，你高兴吧？”他仔细地看了一遍，似乎个别的地方没有看明白，就又看了看，而后点点头。